

新中国首次“国展”选在天津

会展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。1951年,是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第3个年头,国家经济呈现初步繁荣,党中央决定进行一次高级别物资交流会。因这次物资交流会活动规模大、范围广,需要良好的交通条件和展览空间,于是选择天津承办这次展会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国家级经济交流展会,也是天津首次承担的国家级展会。

文献记录首次“国展”

天津有一群民间收藏爱好者,他们持久而积极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乡土文献,其中就有1951年举办的“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”全部文献资料。包括《华北地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参观向导》《华北地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纪念册》以及展览会纪念章、展台纪念戳等文献,详细记录了这次展会的内容。其中有当时天津的电车路线图,主要接待饭店、商店、旅馆、影剧院的位置,是当时全新的天津指南手册。



▲1951年12月27日至29日,毛主席参观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。
▲展会资料。

首先为农民兄弟服务

由于历史原因,农民长期被歧视,把他们和保守、落后、贫穷连在一起。这次物资交流会要求将农民摆在第一位,让他们感到天津人民对农民的尊重,充分体现工农相依的关系。鼓励农民将土特产品中的农、林、果、毛皮、药材等物卖给国家支援城市建设和出口创汇。同时让他们看到工业生产研制出的新农机、新农具、新农药、新化肥及为农村制造的各种生活新用品。

天津,所以大会组织者在向导手册中标注了城市卫生要求和交通规则,标明展会联络问询站详细地址,包括马场道大会会场、火车站、平安电影院、光明电影院、国民饭店、东马路青年会、广西路青年会、利顺德饭店、中南旅馆、北站福星栈、津门文具店、中央药房等接待单位。这些单位都是全市极易找到的地方。同时郑重承诺:各商业部门对农民代表消费一律95折,理发7折。

天津30个著名饭店打出“热烈欢迎农民兄弟,吃饭打折”的口号。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。为让农民了解工业,天津企业公司和行业公会选出22个企业代表让他们参观。农民朋友看到了棉花经过纺纱、针织、印染、漂洗成布的全过程,看到漂亮暖瓶生产的过程,看到了炼钢、轧钢和工业生产的双轮双犁等,农民代表纷纷表示,一定努力生产,多打粮食,多种棉花,为工业提供原材料,向工人老大哥学习。

丰富展品振奋民心

新中国第一次大型展会由于宣传深入、准备充分、展品丰富,让与会代表和参展者特别振奋。17个展览馆共征集上千种物品,各种优质农产品让人目不暇接,几十斤的瓜,鲜艳的深州蜜桃等果品,享誉世界的华北麻黄、甘草、山药、红花、牛夕、菊花、薄荷和山区多种珍贵兽皮,外贸急需的各种羽毛,河北的长绒棉花等物品

让人们看到了祖国的地大物博。22个工业行业生产的各种工业品,特别是小型农具及大车轴承吸引了农民,许多代表纷纷询问,如何将旧式大车改成胶轮轴承大车。最感人的是参会农民代表通过参观提高了觉悟,表示一定将自

己的物资卖给国家。天津承担的首次大型展会为天津迎来了新中国的首个喝彩。(据《今晚报》)

红色百宝箱 奋斗百年

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9号,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所在地。在土地革命战争馆里,陈列着一部电台。这部电台装在一个木制箱里,电台开关和调节旋钮锈迹斑斑,变压器、线圈等零件布满尘垢。别看简陋陈旧,它却是红一方面军的第一部电台,在红军一次次战役中“屡建奇功”,并与党和国家的通信事业和新闻事业密切相关。

永不消逝的“半部电台”

1930年12月底,红一方面军歼灭了孤军冒进的国民党军第18师,毙伤俘敌师长张辉瓒以下9000余人。

“在这一仗中,我们缴获了18师的电台。”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警备区副司令员的李衍福回忆。其实,这部电台是“半部电台”,发报机已坏,只能收报,不能发报。

1930年以后,随着根据地的建立,红军的作战形式由游击战过渡到以运动战为主,为了便于组织各地区部队配合行动,及时获取消息至关重要。当时为了得到外面的消息,只能派一些红军战士进入敌占区打探,但这风险很高,许多战士为此付出生命。

对红军部队来说,这“半部电台”极其珍贵。“经修复使用后在对敌侦察上发挥了不小作用。”据曾任无线电队长队的王净后来回忆,当时国民党部队每到一处,用电台联络时,都先问对方在何处,以便确定位置,且联络都用暗语,这等于不断地向红军报告部队的行动和部署。

几天后,围歼国民党军另一支部队谭道源师时,红军又缴获了一部完好无损的无线电台。至此,红军拥有了一部半电台和一些技术力量。

1931年2月,红一方面军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队训练班。不久,上海党中央培养的一批报务员来到江西中央苏区,使苏区无线电技术力量进一步壮大。

不久后,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“围剿”。在这次作战中,红军靠着电台听到了敌军的行动方案。毛泽东、朱德依据情报周密部署,在观音崖、九寸岭布下天罗地网,红军似神兵天降,漫山遍野杀声震天……捷报频频传来,电台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1931年11月7日,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开幕。新华通讯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于当天成立,并首次以红色中华通讯社的名义通过红军的无线电台播发新闻。红色电波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,传向全中国、传到全世界。

红中社对外播发新闻的呼号是“CSR”(即Chinese Soviet Radio,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的缩写)。这个呼号一直被沿用20多年。

红军的这些电台使得红中社有了建社的技术保障,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新闻封锁,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新型的通讯社的诞生。从此,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声音,以及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革命的消息,通过红中社发出的电波,越过万水千山,传向全中国、全世界。

红军的这“半部电台”一直没被丢弃。它陪着红军战士走完了漫漫长征路,在一次次战斗中立下大功。(据新华社)

赵元任说国语被质疑

赵元任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、哲学家、作曲家,亦是中国语言科学的创始人,被称为汉语语言学之父,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。

上世纪20年代,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,以推广“国语”(即普通话)。赵元任夫妇到香港,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。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,通晓国语的不多。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,国语就很糟糕,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。赵无奈。谁知临出门,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:“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,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。”赵元任问:“那你说,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?”“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。”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:“他就是赵元任。”店员愤愤:“别开玩笑,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,怎么可能是赵元任?”(据《天津日报》)

徐特立断指血书激励学生

人民教育家徐特立温和宽厚、慈眉善目,很少有人知道他义愤填膺、挥刀断指的壮举。

甲午战争以后,许多不法的外国传教士嚣张跋扈、为非作歹,一些中国教徒也仗势欺人、鱼肉同胞。民众遇到不法侵害时,常常有理难说,有冤难申。

1909年12月8日,徐特立任长沙修业学校向全校师生作时事报告。他痛陈教案实情:“现在的满清政府,极是软弱无能,害怕洋人,巴结洋人,采用的政策完全是惧外媚外。而帝国主义凶恶之焰,一天甚似一天。老百姓不堪忍受,被迫起来反抗,以至酿成教案。但不管在哪里发生教案,吃亏的却总是我们中国人民。”

讲到激动之处,徐特立和学生都痛哭起来。忽然,徐特立跑到厨房,拿出一把菜刀,当场将左手的一个指头砍断一节,用殷红的鲜血书写了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”8个大字,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,激励青年学生反帝爱国。

在徐特立的带动和影响下,一大批青年学生先后走上救国救民之路。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

东方朔妙语连珠谈吐幽默

西汉的东方朔学识渊博,谈吐幽默,被誉为相声界的“祖师爷”。有一次,东方朔跟随汉武帝到上林苑游玩。汉武帝见到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,问东方朔是什么树?东方朔顺口说树叫“善哉”。汉武帝暗中派人削掉树的部分枝干,并在树身上做了记号。

两年后,君臣二人又路过此树,汉武帝故意问东方朔:“这棵树叫什么名字?”东方朔又顺口说叫“瞿所”(传说中的木名)。汉武帝沉下脸说:“同一棵树,过了两年,什么名字就不一样了?你竟敢欺骗我!”东方朔回答:“小马叫‘驹’,大了才叫‘马’;人生下来叫‘儿’,老了才叫‘老头’;树也是一样啊!”汉武帝听后哈哈大笑。(据《天津日报》)

古人的“冰上运动”

有人称,最早记载中国冰雪运动的文字见于志怪古籍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:“有钉灵之国,其民从膝以下有毛,马蹄,善走。”因《山海经》屈居警牙、晦涩难懂,如何理解难以形成统一标准。故而,千百年来,人们对其理解也见仁见智,晋代著名文学家、训诂学家郭璞注释为,钉灵国民的膝盖以下长有长毛,形似靴子,跑起来便能“自鞭奋蹄”。

而东晋刘宋时期著名史学家裴松之注释《魏略》却说,“乌孙长老言,北丁令有马胫国,其人声如雁鹜,从膝以上身头,人也。膝以下生毛,马胫马蹄,不骑马而走疾于马。”

其实,直接记载“冰雪运动”的文字,隋唐时期才初见端倪。《隋书·列传·卷四十九》“契丹室韦”条曰:“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,分为九部落……气候最寒,雪深没马。冬则入山,居土穴中……射猎为务,食肉衣皮……地多积雪,惧陷坑阱,骑马而行。”南北室韦皆古代东北少数民族,在气候严寒、积雪甚深的环境下,当地人发明了木质滑雪工具,堪称一种省力便捷的交通出行方式。

而“冰上运动”文字记载最早见于《新唐书·列传·卷一百四十二》“回鹘下”条谓:“东至木突厥三部落……桦皮覆室,多善马,俗乘木马驰冰上,以板藉足,屈木支腋,蹴辄百步,势迅激。”意思是,向东可到木突厥三部落,这里人用桦树皮做屋顶,多好马,习俗在冰上乘木马奔驰。所谓木马,即用板系在脚上,用弯木支在腋下,一使劲就可溜出百步,既快又有力。

宋代开始,冰雪运动便不再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专利。北宋孟元老和沈括的史料笔记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梦溪笔谈》等均有中原地区的冰上游戏的记载。明清时期,踏雪、滑冰等冰雪运动便大步向娱乐化、大众化方向发展。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

这段时间,各大购物平台的购物节已经火热开启,商家的各种优惠和促销手段层出不穷。其实,商业活动自古就有,且花样迭出。那么在古代,人们购物是怎样一番景象呢?



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热闹的街市。

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集市

古人虽然没有专门的购物节,但人们常常利用原有的节日,将过节和购物合二为一。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固定地点买卖货物的市场:“集市”,人们在一些固定的日子去购物就叫“赶集”,等到集市到来时,人们往往会把想买的东西尽量买齐全。有人还会“赶早集”,甚至半夜就要起来。逢年过节,集市上更是热闹非凡。集市有着悠久的历史,即便是殷商时期,交通工具不发达,货币流通也不成熟,但商业依然非常繁荣。《周易》中记载:“日中为市,致天下之民,聚天下之货,交易而退,各得其所。”

随着商业的发展,集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北朝乐府民歌《木兰诗》中花木兰代父从军前,“东市买骏马,西市买鞍鞯,南市买辔头,北市买长鞭”,由此可见,在北朝时期,集市里就出现了类似现在的“百货专区”“食品专区”“洗护专区”等。

到了两宋,集市更加兴旺。根据北宋赵抃的《成都古今集记》记载,成都月月有集市,他这样写道:“正月灯市,二月花市,三月蚕市,四月锦市,五月扇市,六月香市,七月七宝市,八月桂市,九月药市,十月酒市,十一月梅市,十二月桃符市。”每月集市虽有专属的名字,但不限于销售的货物内容,如酒市出售文君酒、锦江春、鹅黄酒等,也出售农具、铁器、草药等商品。

书中记载,成都的大慈寺是佛教圣地,唐三藏曾在此受戒,它又是成都“十二月市”的重要交易平台,常呈现出“商列贾次,茶炉药榜,贩脂卖浆,倡优杂戏之类全然其中”的繁荣景象。当时,人们并不认为集市的热闹,会影响寺院的神圣,“以游戏之多,而知一方之乐也;以施予之多,而知民生之给也;以兴葺之多,而知太平之久也。”

古代商人如何推销商品

古人卖货也打广告

想推销货物,免不了打广告。古代商家为了卖出自己的货物,敲锣打鼓,高声叫卖,印发广告,降价促销等方式应有尽有。古代商家最简单又实用的广告莫过于“吆喝”。宋代商人善于推销商品,叫卖声非常有特点,不仅各有语调,更会附上精心编写的辞章。宋代高承在《事物纪原·博奕嬉戏》中有过记载:“京师凡卖一物,必有声韵,其吟哦俱不同,故市人采其声调,闲以词章,以为之乐也。今盛行于世,又谓之吟叫也。”

到明清时,吆喝已是一种最广泛的宣传方式。清代一位叫做闲园鞠农的人,专门将各种市声辑撰于《燕市货声》一书,现在的人们通过书籍,能了解当年的叫卖声:“口琴来!卖口琴来!”——说是卖口琴,其实是卖骰子、纸牌、骨牌等小玩具的;“喂,活鲤鱼呀!”——并非活鲤鱼,而是由纸制成,初二祭财神时往河里放的。“牛儿芒儿,过年的小黄历!”——一文钱两张的《春牛图》,从十月份一直卖到立春,是每一位种田的农夫必备的幸福物。

除了吆喝,广告宣传也不可或缺。宋代时,印刷术推广后,商家的广告形式推陈出新,广告内容也更加多元丰富。北宋时期,山东济南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铜版印刷“宣传单”: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”的印刷广告。这则广告中间印着白兔抱铁杵捣药的图案,图案左右标注“认门前白兔儿为记”,下方有说明商品质地和销售办法的具体内容:“收买上等钢条,造功夫细针,不误宅院使用,客转为贩,别有加烧,请白兔。”也就是说,若买家批量购物还可以优惠,无形中也扩大了店铺的影响力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